

罗达成《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》

一本有血性的书

□陈丹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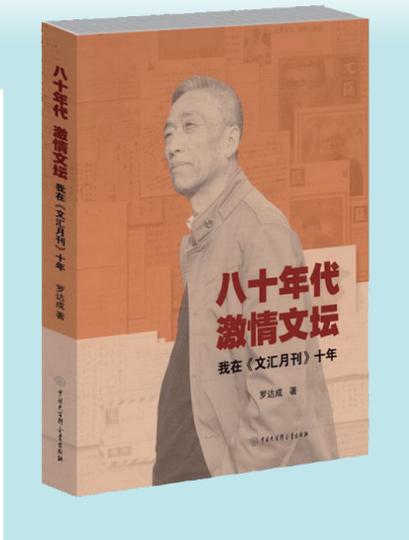
《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》是我的好朋友、老朋友罗达成的新作。他写了这本好书，我理应该来祝贺他的成功。在这之前，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在《上海文学》连载过，都是非常精彩的；现在看到全书，更是一口气把它看完，是我近年来读书很少有的。

正如书名，这本书写了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文坛，也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编辑、作家的形象和他们的故事，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洋溢着激情的氛围。梅朵、达成、谢蔚明……很多《文汇报》的编辑，都是我熟识的朋友。他们有激情，有胆识，有对文学的痴情热爱，敢于解放思想，敢于为天下先，敢于冲破禁区，敢于为人所不为不敢为的事。主编梅朵在达成笔下得到生动真实的展示，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事业心，无私地献身于《文汇报》的老文化人。特别是不能想象一个经历了22年非人的苦难生活折磨后还有这样一往无前的勇气和炽烈的热情。我在中学时就爱看他的影评，知道他的大名，是我的前辈；到了80年代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，完全没有年龄辈分之隔。达成叙写他“狂妄滥炸”式的催稿，风风火火的工作气派，文学界却没有人因此恼他烦他：因为理解他的热心，常被他的热情所感染，都觉得他可爱可敬，是好朋友才会被这样对待。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关系，是互相合作，大家都是怀着激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奋斗。我自己也是做编辑的，很惭愧，远没有他那股劲。我想这是一个人的品格，一种精神境界。我每次收到他的电报电话催稿时常常会笑起来说：“这个梅朵！”直到今天读达成的描写还是那么真实，仍然感到他那

么可亲。

我非常喜欢达成的文风。他的文字既朴实近似口语，没有一般报告文学常有的浮夸做作，又充满了激情和真诚，火辣辣的且又轻松、俏皮，那是他的“真实性情”。他把一个个人物都写活了。因为他热爱这些人，是带着深厚的感情写的。这些章节写的虽说是三四十年的事，现在读来仍然令人震撼、令人深思。那样的文章就像王国维引尼采的话是“一切文学，余爱以血书者。”达成写的书就是有血性的书，写的人物也都是有血性的，作者达成自己也是位有血性的男儿，不顾自己的病痛才能写成这样激情四射的书：无论写丁玲、胡风的回归，舒婷、北岛、李谷一等新芽的挣扎出土，都是惊心动魄的。达成的书透过一个期刊的历史命运，把那时的文坛和社会风尚、时代氛围，形成一股激流，生动且有声有色地呈现现在我们面前。这可能正是大家怀念80年代激情文坛的原因。

这样的激情文坛的出现，首先是因为解放思想。解放思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。是从几十年的现代迷信桎梏中解放出来，是从一个违背历史常识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。用鲁迅的比喻是从铁屋子里解放出来的。那是人的解放，人的精神的解放。那种自由探索、反思历史、批判精神、激励创新……正是今天人们怀念留恋的原因。那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突破禁区”，要破除各种各样人为设置的禁区，才能有人的解放。没有思想的解放，就没有80年代这一切，也就没有激情的《文汇报》，激情的文坛。



但即使80年代，也是面临巨大的阻力的，不断遭遇挫折的，总有一种守旧势力想扑灭这样的激情，阻挡这样的潮流。我们看达成的书其实写的都是正能量，都是光明面，都是主旋律，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。8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并非一片歌舞升平。达成书中也有所涉及，但总觉得还不够。历史的真相看起来多了一点轻松感，少了一点沉重感。写这样的书，是为历史作证：作为参与者、在场者、见证者提供的第一手材料，是一位亲历者的历史真词。

阎受鹏孙和军《东极之光》

历史回顾中的人性之光

□王学海

报告文学的题材，在社会变革中总在不断变化，它指向创作者搜集目标时的那种眼光，抓住语言之梦中的铿锵饱满的颗粒，同时也让创作者抵达生命的更大空间。

《东极之光》(阎受鹏、孙和军著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)以一个历史性的突发事件，记述了以浙江舟山渔民为代表的中国人民，在抗日战争中震撼世界的人道主义大救援——营救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300多名英军战俘，为沉默了半个世纪的“里斯本丸”在东极极地沉没的国际性事件再作历史新叙述。

《东极之光》的一个特点，首先是给予读者新鲜感，营救英军战俘虽然已是75年前的旧事，但读《东极之光》报告文学后，这战争旧事却让你无法否认恰是一种新鲜的审美感受，它让我们的心灵震撼，也让我们精神飞扬。读了《东极之光》，我们知道了东极是怎样美丽的一片岛屿时，更知道那里的渔民都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同时知道“舟山群岛有一种特殊的文化——海滩文化，任何海面上漂来一具尸体，他们都要打捞。打捞上来便“梳洗干净，整容着衣，然后白幡招魂，念咒魂经咒，再郑重地入棺，与自己的祖先葬在一起”。任何一个海难必救，任何一具浮尸必捞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性之举呀，却早在数百年甚至千年前，就已经在这里——浙江舟山群岛，成为栖居在这里靠海生活的渔民的一种最自然的行为，而我们身处通讯如此发达的高科技时代，却还是第一次从《东极之光》里获知，这样的新鲜感，绝非单纯的新闻性或新奇性，而是一种文化精神使我们敬仰，让我们折服：“每一座岛子都有安葬海上浮尸的坟墓区域，称‘义冢地滩’，有些岛子还建有‘义火祠’，清明时节，这些安息异乡之魂的坟头上也照样摇曳着一杆白幡，墓前也照样有人焚香点烛吊唁，摆几盘冷菜，烧一叠纸钱。”读了这些文字，立即会让我们想到中国的“心性之学”，孟子的“尽心”，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在这里有了最实在、最有力、活生生的现实表达！也让我们想到为仁成圣的中国文化，往往总是毫不张扬地体现在最基层普通人身上，并焕发出经年不衰的光芒。

《东极之光》的魅力，还在于本书中国际人道主义的高扬。它告诉世界，这种国际人道主义，是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觉行为，是发自内心的仁爱，浙江舟山的渔民在营救“里斯本丸”被俘英军的海上大救援中，在日寇搜捕全岛时，岛上百姓没有出现一个告密者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美德。

《东极之光》在揭示生命真谛之时，还以史实的沉重，为我们别开生面地介绍了缪凯运这个人物。他是积极的营救者，又是曾在历史前行中的复杂人物，尔后又由于错案冤案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，以至在“里斯本丸”大营救这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档案中，未曾出现过他的名字。

《东极之光》在结构与用词上也颇有特色。第二章的“东极渔家”其实是东极的史志与民间传说的结合，与东霍洋面大营救无关。但阎受鹏、孙和军两位作者似乎特别注重这一章的叙述。这是因为他们没去史志上或传说中摘取几笔以作叙述的铺垫，而是专门辟出一个整章，从民间传说、历史史实、地域特色，乃至渔民画中的传奇故事中萃取精华，为此长篇报告文学作了厚重的奠基。东极岛也好，整个舟山渔民也好，那种人道主义善举，绝非倏然空降而来，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。并且，两作者巧妙地把这一章不是作为通常开篇的习惯性安排，而是在叙述了“英俘被日军押进地狱”后，再开始记述，初看有点突兀的安排，其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

正如作者所说，变动的是世界，沉淀的是历史。“里斯本丸”的沉船救助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，但它的内涵，恰像是历史中的一束光，在追溯历史不断的反思中，在走向世界的征程中，在我们当下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深化中，闪光的人性，始终在熠熠生辉。



苗福生《远去的背影》

一部书写乱世情缘的佳作

□丁国芹

阅读苗福生《远去的背影》，开始的时候，我是把它当作爱情故事来阅读的。

生当贫弱乱世的一对男女，在异国他乡(日本)求学时邂逅，男才女貌，又有共同的学术志趣，很自然，两颗心便越走越近。终于在返国之后面临分手的那一夜，“搂在一起，哭在一起，吻在一起”。这样的爱情故事，读起来自然是引人入胜的。但是不免有些老套，无非是才子佳人、一见倾心、始乱终弃之类司空见惯的情节。

不料，小说的新意之门从此开启：人格、经济皆独立的女主人公傅云，在发现自己怀了爱人的孩子后，毅然拒绝了家里安排的相亲，只身到了上海。独立谋生，自己抚养孩子。旗袍制作生意风生水起，日子也过得富足惬意。而原本有家室的男主人公李逸山，到了北平之后，也全身心投入青铜器的研究与收藏，在学术界和收藏界成了有影响的人物。但是，貌似两条平行线的男女主人公，既非从此相忘于江湖，也不因旧情难忘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，更没有因为相爱不能相守而反目成仇，而是按下私情不表，携手同纾国忧：南北呼应，共同守护祖国的珍贵文物。男女之爱，转化为爱国情怀，谱写了一曲高亢激越的知识救国协奏曲。

我有很多年没有认真读长篇小说了，这一次，无疑是非常美好的经历。以至于终卷之时，有意犹未尽的惆怅。好读书读易，佳人期未来啦！

美好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：作者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热情。任何人翻开小说，读上几页，都会清楚地感觉到，作者苗福生先生实在是一位真诚热情之人。爱恨情愁，笔底下是一派诚挚恳切景象。阅读《远去的背影》，我有个强烈的感觉：文如其人。无论是塑造人物，讲述故事，还是表达思想，苗福生先生的胸中笔下，无不正气凛然，热情似火。认真的读者，很难不受其感染，受其感动，受其感化。

书中蕴涵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。阅读小说，不同于翻阅知识读物、专业论著，不以汲取知识为主要目的。但是，倘若作品能巧妙地将知识与见识跟故事、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使人在欣赏语言艺术的同时，学到许多新鲜有趣的知识，那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。《远去的背影》讲述的是保护国宝青铜器的故事，其中涉及不少青铜器、书画艺术、文物收藏、古董销售等方面的知识。这些知识，对于普通读者肯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。

若干人物的成功塑造。一部长篇是否成功，人物塑造是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指标。《远去的背影》中，有三个人物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其一是女主人公傅云。显然，作者是把她作为上世纪初接受了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女性来描写的。温婉却不软弱，敢爱却不自私；能呵护家人，愿守护国宝；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，同时也是一个很容易令异性心生爱慕的女性。其二是傅云留学日本时期的老师、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岛本雄二。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是，不落俗套，刻画细腻真实。起初，他对傅云的蛮横追求是厌恶的。但是当傅云受到街头痞子骚扰与威胁时，他又挺身而出。当追求无望的时候，他也能够保持绅士风度。在中日开战成为敌国的时候，他仍能坚守学者的本色。还有一个人物是艾米，旅美华人，傅云的外孙女。小说中艾米跟王忆梅一样，是一个串场人物，作用主要是引出生活于上世纪初的男女主人公。但是，由于作者有先抑后扬的巧妙构思，艾米成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人生理想的化身。艾米身上理想的光芒相当炫目、动人。

《远去的背影》是作者的一个副产品，主产品是一部学术考证性质的纪实散文《最后的秀才》——副标题已经很好地概括了这部书的内容：清末民初金石书画收藏家李汝谦传略。作者苗福生先生说，《最后的秀才》的传主李汝谦和《远去的背影》的主人公李逸山其实就是一个形象，两部作品一实一虚，互为补充(见《远去的背影》作者自序)。把两部作品对照着阅读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

趣味之一是，可以借此窥见作者的理想世界。两部书实际上不只是虚实互补的关系，还有虚构对真实的改良。比如说，《最后的秀才》中，李逸山的人生是妻妾成群的，他留学日本时，傅云以姬妾身份陪侍。而《远去的背影》中的傅云却是新型的独立女性。小说中李、傅的平等爱情，表现了作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敬意，寄托着作者本身的人生理想。

趣味之二是，了解纪实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转换的甘苦。苗福生坦承，写作《最后的秀才》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。可以想象，创作《远去的背影》，是他对自己写作《最后的秀才》过程中付出的所有艰辛的一个补偿。是一次身心的自我放飞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文学创作是要让心浮起来，而学术研究则要让心沉下去。一浮一沉，艰辛痛苦，却也痛快过瘾！

虽然，白描的新作《天下第一渠》将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是确切知道的，虽然，白描会在第一时间把新鲜出炉的作品送给我也是意料中事，但“书已印完”的消息传来仍然令人振奋，当散发着油墨书香的《天下第一渠》捧在掌上的时候，我依然为之欣幸：文学的百花园里又一朵奇葩绽放了！

《天下第一渠》令我赞叹的首先是它可贵的真实。当今，“戏说”已成泛滥之势，胡说不也稀缺。更可怕的是，一些打着“正说”旗号的文艺作品和文化宣传也在以假乱真，戏弄历史。不仅古代，就连现代革命史上铁定的历史事件都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使出“挪移大法”，由此地挪到彼地……而白描，凭着他对历史的尊重，对读者的负责，也凭着一个作家过人的胆识和勇气，为我们忠实而艺术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发生在秦、韩两国间那场交织着杀伐和阴谋的生死决斗。他完全可以在他的《天下第一渠》的封面写上这样的题词：“我不曾戏说，也无所谓言”。

其次，我不能不赞叹它难能的不同。郑国渠是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，但就我的阅读所见，无论历史的，文学的，除了引用史书上少而又少的记载看不到其他任何消息：韩国怎么得知秦之泾阳县西北方仲山骠口可以引泾修渠？又凭什么断定秦王一定会相信郑国的游说，而在战争年代启动一项浩大的工程？“疲秦”之计败露后，郑国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继续修渠的？如此等等，连一点推测、猜想都没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要用纪实文学勾勒战国后期错综复杂的“国际关系”，描述郑国渠的来龙去脉，呈现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，这等于把白描推到了历史的悬崖绝壁上。

但白描很从容、精细，也很敏锐。他从历史深处的蛛丝马迹打开思路，缜密分析、驰骋想象，荡开这一题材中横亘于前的一个个难点，纵横捭阖，有声有色地为我们描绘了那个计谋百出的特殊年代所催生的对秦蜀、对秦地人民的具有“万世之功”的水利奇迹——郑国渠；为我们复活了一个尴尬而伟大的历史人物——郑国。并且，引领我们感受了一代雄主秦嬴政的王者风范，正是他，最终成就了郑国在古代水利史上的美名。

“第一渠”由白描来写这是因缘注定，而作品独具风格，却不能不称颂作者的功力。

值得称赞的还有整体的耐看。书到了“下篇”，时间已是现当代，没有贯穿始终的事件和人物，这是很难写的。但作者在每一时段围绕着重渠横向辐射，使每一章都相对独立，这样，读者任意打开哪一章都可以欣赏到一篇完整的散文。看第25章你忘不了：瓦头坡那个生活在贫困而又畸形家庭的姑娘，别人举手之劳的帮助，她便偷出家里的红薯回报。苦日子的阴霾遮蔽了她青春的美丽，却遮不住她美好的心灵。读第28章更难以忘怀：一位曾经经历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，在1937年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流落到泾阳，嫁给三寨口一位农民。她不知道，她千辛万苦寻找的部队就在仅仅几十里外的安吴堡办训练班。当年，家人怕她知悉后离家去找部队，瞒着她；后来的几十年里，儿女家人怕她知道当年的情况后精神崩溃，仍一直咬牙不提青训班的事，直到她去世。这位政治运动中曾被当做“假红军”多年审查的传奇女子，正是作者的母亲。读到这里，我不由慨然长叹：人生，竟有这么多难言的无奈！长达40万字的散文中，知性与感性融汇，几乎每一章都有让人动情处，太不容易。

可以说，《天下第一渠》是关中水利史的锦绣长卷，是关中地方文化的精华荟萃，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精神光照照泾渠流域的文学标本，其表达既有万山红遍的壮美，也有大江东去的豪放，更有月是故乡明的亲切与深情。

《霸业原如春梦短，文章常共大江流》。我相信，《天下第一渠》是经得起时光检验的作品。

杨小滨《洗澡课》

语言的享乐主义者

□张伟栋

一部诗集要读到三遍，才能大致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。但即使知道，也未必能说得清楚，有些领会而已，要知道，诗里的事情最难以言传。杨小滨的这本《洗澡课》，我刚好读了三遍。第一遍是刚刚拿到诗集的时候，坐在沙发上翻看，伴随着阳台上洗衣机的轰响，心中感叹，或许这是小滨最好的一本诗集，集20年之大成，倘若他日后能超越这一本，汉语中能和他比肩的当代诗人屈指可数了。诗集翻完，就被归置到书架诗集一栏，一般都是如此，当作资料收集起来，如果不是特殊原因，短时间内很难被重复阅读，这是我做研究工作养成的习惯，因为大量的书排着队等待阅读，没有时间分配给予研究、思考或写作无关的书籍。关于阅读，我必须坚持这种宿命论的原则。

就这样，差不多过了一年，才开始第二遍的阅读。这一次，我认定他是语言的享乐主义者，他崇拜无限与轮盘赌，与语言的苦行主义者相参照，后者崇拜圣洁与永恒，所以他会这样写：“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门槛。”“你扛起四楼就奔向远方。”(《购屋指南》)“雪下得比脾气还大。梦里的儿童/在云上推出了好几墩胖乎乎。”(《开车经过一个名叫驴说的小镇》)语言的享乐主义者，当然是追求语言的快感，语言的最大限度来自于语言的花样翻新，也就是语言的更新与创造，反对语言的固化与陈词滥调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相信世界的无限，不是吗，无限就是语言的秘密，布莱克在诗中洞察了此中真意：“一粒沙里见世界，/一朵花里见天堂，/手掌里盛住无限，/一刹那便是永恒。”(《丰子恺译》)杨小滨的“无限”与布莱克唯一的区别只是左与右的区别，所以他这样来定义“无限”：“头巾下的水冒出闪电，眼波不输妖媚海峡。/岸边，鲜花多妻，蝴蝶扑朔一身耕种。”(《霏雾州的西湖》)

像乔伊斯一样，杨小滨的语言采用了四重含义的机制(套用索尔蒂斯《乔伊斯与团体》中的观点)：文字的、情色的层面(“女世界”系列)、历史的层面(“主义”、“指南”系列)、神话或本原的层面(“法锚”系列)、原乐层面(是在欲望问题上止步的驱力，是他写作的不断僭越、突破边界的动力)。四重含义的机制使他置身于写作的边缘线上，实验宇宙大爆炸的奇迹。

第三遍阅读，起因于我计划写一本关于鲁迅《野草》的书，我为此筹划已久，列出100部诗集的书单来读，《洗澡课》便在《野草》的透镜下重新展现它的纹理。正所谓，“康德即萨德”，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，一个语言享乐主义者能化身为不同形态。鲁迅在《我的失恋》中写道：“爱人赠我百蝶中；/回她什么：猫头鹰。/从此翻脸不理我，/不知何故使我心惊。”如你所见，《野草》有它“解剖”与“拆解”的一面，而“拆解主义”也是杨小滨的拿手好戏，他的《送你一朵玫瑰疹》因此可以看作是《我的失恋》的2.0版本：“喂你一口西西瓜，/还我什么？/一轮明月。女白眼赶走了男马托邦。”

坚持阅读的宿命论，意味着接受书籍出现次序对自我的改造与刷新。《洗澡课》所刷新的是，我对当代诗秩序重新认识的欲望。《洗澡课》是新诗漫长的历史所孵化出来的新生事物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这近100年的累积，不可能诞生如《洗澡课》这样的作品，它是新诗成熟之后的产物，我相信，《洗澡课》是某个重要的新开端，同时也是新诗确认自我的一个界标。

文章常共大江流

□冯巨乾

